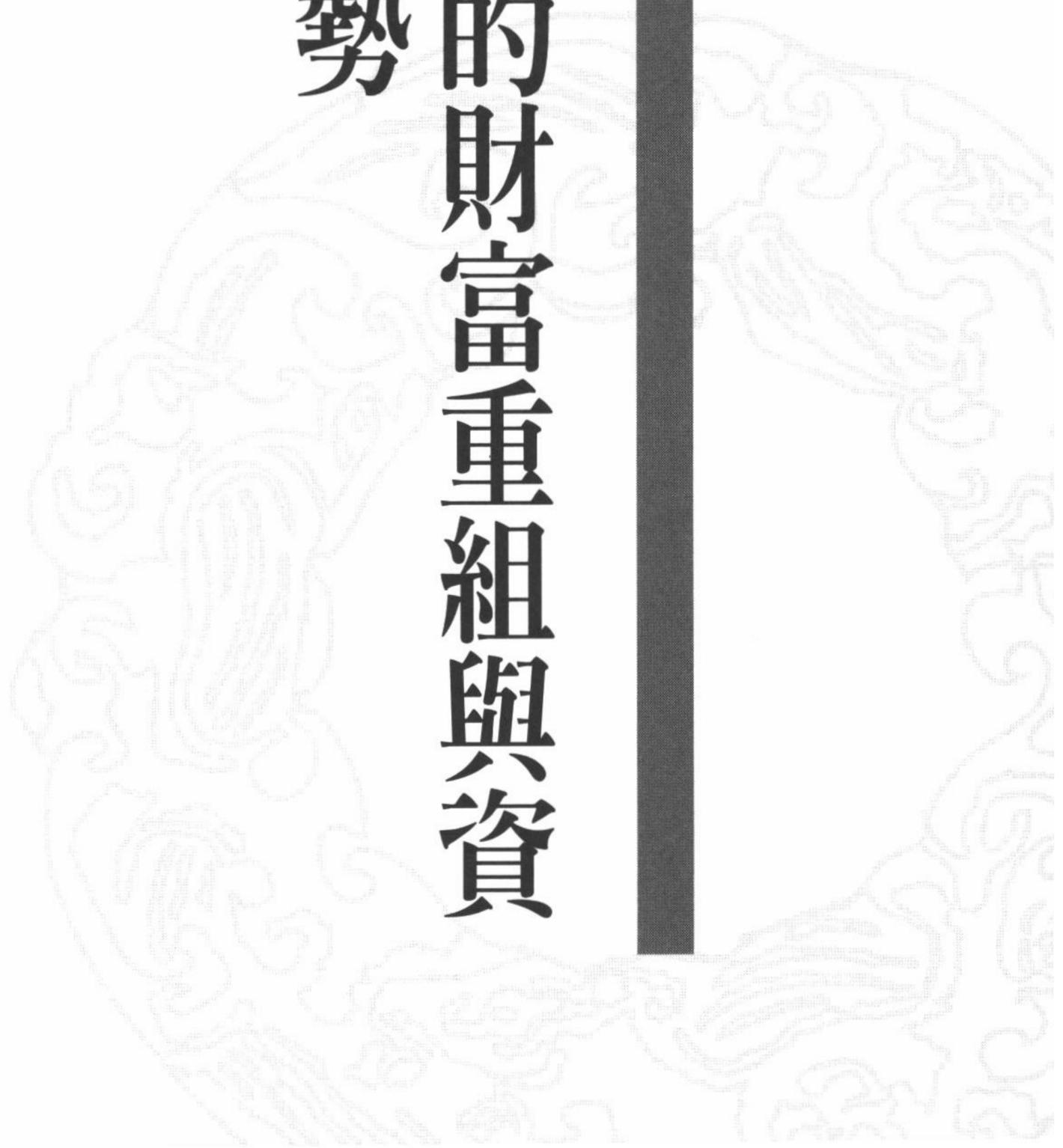


議題一之一 全球化的衝擊

全球化浪潮下的財富重組與資源分配的大趨勢



- 全球化浪潮下的資源分配趨勢
-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尋找台灣定位
- 積極創造比較優勢 擴大台灣能見度
- 探索全球化 走出台灣活路

主持人 孫 震（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元智大學名譽教授）

發表人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評論人 徐小波（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而誠（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賴幸媛（立法委員）



主持人

孫震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元智大學名譽教授。曾任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台灣大學校長、國防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專業領域為經濟學。代表著作有《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人生在世》、《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

發表人

朱敬一

美國密西根大學ANN ARBOR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專業領域為人口經濟、法律經濟、財政學。代表著作有《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信》、《經濟學的視野》、《基本人權》。



心與我



評論人

徐小波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美國塔夫茲大學佛萊轍法律外交學院外交學碩士。現任宇智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時代基金會執行長、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專業領域為公司經營及跨國投資策略之規劃以及資本市場與證券金融等相關法律諮詢。代表著作有《合資事業法律問題之研究》、《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之法律研究》等相關書籍。

華而誠

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任全球策略投資管理公司總裁暨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中國、拉丁美洲第三局首席經濟學家、國際貨幣基金會經濟學家、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研究員。專業領域為經濟發展、國際金融、大陸經濟。代表著作有《中國經濟的軟著陸》、《貿易順差》、《臺幣升值》、《與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華而誠



評論人

賴幸媛

英國薩克斯大學發展研究博士。現任立法委員。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WTO二〇〇一年入會談判執行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兼國際事務處處長、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秘書長、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心創辦人兼負責人。專業領域為經濟安全戰略、區域整合、援外工作、國際關係與組織。

【發表】

全球化浪潮下的資源分配趨勢

◎朱敬一（中研院院士、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面向很多，包括歷史、文化、政治、環保等。這些面向在田弘茂教授的演講中，已經做了很好的整理，因此，本文主要從經濟面切入這個議題。

談到全球化，有很多人會想到全球化後所帶來的M型社會問題，本文的重點便是要探討全球化浪潮下的資源「分配」意義。此處所指的分配，既包含一國之內人與人之間財富及所得分配，也觸及國與國之間在全球化浪潮下資源分配的趨勢。這些都是源自全球環境改變所致。

全球化一字的源頭已難以考據，但若從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大概不難歸納出以下數端：一、運輸革命：由於各種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天涯若比鄰，實體產品、原料、人員

的運送成本大幅降低，也使潛在市場競爭的範圍擴大。二、通訊革命：由於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通訊、信件等訊息的運送速度加快。bytes和原子可以互換，例如大家拿在手上的報紙是以原子形式呈現的實體，現在透過電腦與網路，轉變成bytes，成為一篇篇網路文章。三、冷戰結束，全球經濟體重組：政治經濟結構改變，使得原來不可能併在一起的的事物，擁有重新組合的機會。例如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冷戰時期地球另一半人口、國家所共組的蘇聯與東歐共產體制瓦解，中國與印度走向改革開放，大多數國家先後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球經濟秩序於焉重組，各國間貿易壁壘降低，加上歐盟、NAFTA、ASEAN等區域性貿易組織形成，亦使得各區內的貿易更形便利。

不分大小國 全球所得分配快速惡化

在表一中，我們列出了台、美、英、日、中、印、韓、港、新等九個國家過去十年的經濟成長率。挑這些國家的原因，大致想要涵括亞洲四小龍、亞洲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日、中）、西方世界科技龍頭（美）、歐洲老牌工業化國家（英），以及亞洲新興的軟體工業大國（印）。由表一可知，若從過去十年的平均成長率來看，台灣約為四·四五%，大致

上維持平盤，美、英稍慢，日本則更慢。日本在前面七、八年消沉許久，最近兩三年才略見起色。至於中國大陸與印度無疑是過去十年間的新興大國，經濟成長速度極為驚人。

而在表二中，則可觀見各國所得分配狀態的改變。我們列出相同九國的吉尼（Gini）係數，刻劃各國所得分配的不平均度。印度二〇〇五年的數據雖然上網無法查到，但從所
有其他能夠查到的數據顯示，不論經濟成長快慢，除了英國之外，相較於一九九〇年，各國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惡化速度皆非常快。此趨勢與所得成長速度無關；無論所得成長最快的中國，或是所得成長最慢的日本，其吉尼係數都在增加。台灣過去十年的經濟成長率在表列九國中算是普通，但是吉尼係數卻也明顯地惡化。英國的吉尼係數沒有惡化，或許與歐洲國家社會福利的制度有關，但此處我們不擬深究。

當然，各國國內所得分配的惡化原因不一而足，以下大致分成公司經理人（CEO）薪資飆漲、知識經濟來臨、全球化趨勢等三個方向加以探討。

經理人薪資喊漲 勞工依舊苦哈哈

經理人和勞工薪資差距遽增，可能受到發行股票選擇權、私募基金搶人等因素影響所

單位：%

	19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平均 成長率
台灣	6.3	6.6	4.5	5.7	5.8	-2.2	4.2	3.4	6.1	4.1	4.45
美國	3.7	4.5	4.2	4.4	3.7	0.8	1.6	2.5	3.9	3.2	3.25
英國	2.8	3.0	3.3	3.0	3.8	2.4	2.1	2.7	3.3	1.9	2.83
日本	2.6	1.4	-1.8	-0.2	2.9	0.4	0.1	1.8	2.3	2.6	1.21
中國	10.0	9.3	7.8	7.1	8.4	8.3	9.1	10.0	10.1	10.2	9.03
印度	7.5	4.9	5.9	6.9	5.3	4.1	4.3	7.2	8.0	8.5	6.26
韓國	7.0	4.7	-6.9	9.5	8.5	3.8	7.0	3.1	4.7	4.0	4.54
香港	4.2	5.1	-5.5	4.0	10.0	0.6	1.8	3.2	8.6	7.3	3.93
新加坡	7.8	8.3	-1.4	7.2	10.0	-2.3	4.0	2.9	8.7	6.4	5.16

表一 過去十年九國經濟成長率

80

單位：%

	2005	2000	1995	1990
台灣	34.0	32.6	31.7	31.2
美國	40.0	34.5	34.4	33.6
英國	32.8*	36.8	36.0	33.6
日本	30.8*	30.1	27.9	28.7
中國	45.0	44.7	38.6	35.4
印度	-	38.0	37.8	28.0
韓國	35.1	35.2	29.5	31.0
香港	53.0**	52.5	37.36	47.6
新加坡	52.2	48.1	39.25	38.74

資料來源：主計處歷年家庭收支調查比較表；2006年APEC會議書；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註：*為2004年資料；**為2001年資料

表二 各國所得分配基尼係數

致。

以美國來說，企業老闆與員工的平均收入比，由一九九〇年的一〇七倍，躍升到二〇〇五年的四一一倍。「經濟學人」雜誌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一篇分析中指出，經理人的收入逐年暴增，應該是與近年流行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有關，而這也牽涉到公司的治理面向。以往，經理人與股東之間，總是有代理人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有時經理人的作為，未必是在追求公司利益之極大化，然而，一旦授與經理人股票選擇權，他自然就有誘因為公司提升股票市值而拼命，以便自己的選擇權能同時實現獲利。因此在許多公司大量發行股票選擇權的情況下，一方面代理人問題解決了，經理人亦確實努力提升公司股價，但另一方面，卻也留下社會所得分配惡化的後遺症。

關於經理人與勞工所得差異擴大，「經濟學人」除指出股票選擇權一項解釋之外，也提到私募基金的影響。眾所周知，私募基金的做法，就是買下一家公司，取得經營權，再用五至六年時間整頓，並積極提升業績，然後再予以出售。過去的私募基金，原本只是全球性的買賣而已，但到後來漸漸變成一個「有品牌的買賣」後，他們更希望在短期間內，看見績效改善的亮眼成果，故對優秀的經理人招募孔急，於是也使得經理人的市場，走向了一個各公司爭搶管理高手的「明星市場」。

台灣中產階級消失 貧窮來襲

Rosen在一九八一年的研究指出，任何一個明星市場的所得分配，都會極端偏向右尾(skewed right tail)，意即極有天份的人將獲得極高的報酬；這自然會傾向呈現一個不均的所得分配樣態。就如同表演藝術一樣，表演藝術人才所得呈現兩極化，是因為觀眾都想看最好的表演，所以大家願意提供較高的報酬，尋覓最好的人才及表演。

這十一年來，台灣中、低所得的八十%人口，其平均所得占社會總所得的比例幾乎都在下降，彷彿所有的經濟成長果實，都被高所得的二十%人口吸收。由於中間所得的人口群並沒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好處，相對而言，他們其實也是在往所得分配的左端移動。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所得分配確實是向極端方向發展。

再以美國為例，事實上，美國所得分配的惡化，從一九八〇年代即已出現。Thurow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書中指出，一九七五至二〇〇〇年間，美國二十五至三十四歲、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工，與高中以下學歷的勞工，兩者薪資差距擴大四十%，而中等技術者與毫無技術者的薪資差距只擴大七%。此一數據顯示，愈是擁有高技術的人才，近期二、三十年愈是吃香，而低技術人才則相對吃癩。

其實，不只是人與人之間如此，在國與國之間亦如此。例如，日本不斷強化精緻的技術，開創自己的獨特地位，也拉大和其他國家的差距。綜合上述，我們發現各國國內所得分配惡化是一個事實，除了經理人股票選擇權及私募基金的影響外，知識與技術的優勢亦有影響。一般而言，知識經濟與全球化應該有相乘的效果；前者使知識與技術的前緣快速更新，後者則使新知識技術的優勢地盤快速擴大，席捲各地。以下，我們將對這兩方面再做進一步的剖析。

知識經濟效應 靠教育革新解決

依Thurow的觀察，在二十世紀末的二、三十年間，技術進步與知識更新是主導世界經濟趨勢的主要力量，他稱之為「知識經濟時代」。

為什麼知識經濟會造成所得分配的不均化呢？我們整理以往的文獻，發現原因概有三端：一、知識具有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特性。就像我們經常發現，如果普通物理學不好，電漿物理也就不容易學好。換句話說，原本知識豐沛的人將比原本之事薄弱的人更容易取得新知識與新技術，漸漸地，兩者之間的知識落差，將更大幅度地拉開了距

離。二、知識具有非敵對性 (non-rivalry)，能突破傳統經濟學規模報酬遞減的宿命。因此，以知識創新為擴充基礎的企業，如微軟、Google，其膨脹的速度較可能不受「規模報酬遞減」法則侷限。這樣一來，自然會造成產業內弱肉強食、強者愈強的後果。以微軟來說，他們的XP作業系統開發出來之後，任何人只要有電腦都能使用，並不會因為使用者愈多而報酬遞減。三、就個人而言，擁有較高技術的人才，例如大學畢業生，由於其接受通識教育的期程也較長，對於全球化的衝擊，多半會有較佳的因應。因為進入全球化後，環境不斷改變，知識更迭快速，優勢稍縱即逝，所有人不得不迎接、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術。但一般而言，通識基礎寬廣的高技術人才，較能適應環境轉變，比較可能順利吸收新知，相對於不利吸收新知的低技術人才，在動態調整上自然較具優勢。

對於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知識普及率較高的國家，較容易適應全球化。有鑑於此，台灣必須回到教育問題的根本，透過教育政策的前瞻與革新，扭轉所得分配惡化的趨勢。

全球化讓世界變成平的

上述皆是知識經濟體系容易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那麼，全球化又扮演什麼角

色？簡單地說，全球化使得「地理隔閡」變得不重要。無論是生產要素的投入，或生產產品的銷售，在全球化時代都是「天涯若比鄰」。用Friedman的語言來說，全球化讓世界「變平」了。

平坦的地球在經濟上有何意義？大致而言，就是市場擴大。

全球化使產品市場擴大，各個企業將面對各種可能的客戶，但在此同時，人人也都可以分一杯羹，亦即潛在的競爭對手必然增加。此外，各個企業得以接觸各地的原料市場，包括人力、土地、機器設備、企業人才等，使得外包（outsourcing），將部分原件生產或裝配線移往他國）或直接外人投資（FDI）的可能性增加，而私募基金更可放大招募的半徑，全球募、全球買、全球找經理人。

客戶增加、對手增加、原料市場增加，三項結果看似分立，實則息息相關。以德國品牌西門子（Siemens）為例，二〇〇六年該公司八十%的銷售、七十%的工廠、六十六%的員工，都是在德國境外運作或雇用。我們可以想見，如此大規模的市場、原料、行銷、生產線調整，其調整成本相當可觀。世界各國及個別廠商能否對全球化做出妥善的因應，就要看它們能否迅速、有效的完成調整。簡單地說，全球化帶來的擴大效果，使得企業決策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放大；做對一件決策將使邊際收益比以往更大，而做錯一件決策

將使邊際成本比以往更為慘重。

更白話一點，以前我們常講「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進入全球化後，在擴大因素影響下，小善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大善，小惡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大惡，再也沒有所謂的小善小惡，都會瞬間變成大善大惡。

應戰全球化英國拳拳到位

媒體報導指出，歐盟在二〇〇一至二〇〇六年間，整體表現比亞洲與美國好，而英國尤其亮眼，主要歸功於面臨全球化時，能夠找出屬於自己的第二條路。

面對全球化的調整，英國表現不凡，「經濟學人」對此有個妙喻，認為英國就像參與一場拳擊賽，而且是阿里和福爾曼同隊應戰的經典賽。福爾曼是一個噸位大、拳頭重的選手，而阿里則是以「蝴蝶步」著名。任何國家想要打贏全球化，必得同時具備「承受」(absorption) 及「機動」(agility) 兩種能力。簡言之，一是要挨得住拳、承受衝擊；二是要伺機而動、一擊中的。如果只有阿里靈活的蝴蝶步，卻經不起福爾曼的重拳，在還沒使出蝴蝶步前，恐怕早已被撂倒；相反的，如果很會挨打，但沒有能力反擊，最終還是無

法打贏拳賽。所以，面對全球化，各國必須像參與拳擊比賽般，既能承受打擊，又能靈活出招，兩者交叉運用，維持自己的優勢。

新商機出現 尤重創新與整合能力

前述擴大效果，不僅反映在市場與生產要素的調整，也會反映在研發創新活動上。

全球化帶來的新商機，與交通運輸的進步或冷戰後全球平台擴大，未必見得相關。就客觀環境而言，新的科技已經創造出舊世界完全無法想像的企業創新。例如：若非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根本不可能出現「搜尋」的需求，自然也不會出現Google之類的搜尋產業。仔細觀之，Google乃由兩種奇怪的東西所組合創造：第一，它需要數學運算人才；第二，它需要行銷高手。以前，數學運算與行銷兩種能力，並不會被放在一起，甚至沒有彼此合作的舞台。又如：若非網際網路與軟體的發達，Wal-Mart不可能發展出電子碼（barcode）直接存貨管理功能，而這個由「資訊」加「存貨」組合創造的產物，已成為炙手可熱的新企管新模式。其他像是網路拍賣、私募基金等伴隨全球化而興起的新產業，也相當程度地改變了全球資源的分配樣態。也就是說，進入全球化後，誰能提出創新，誰就能掌

握優勢。這也和教育有關，過去不太重視科際整合，但無論現在與未來，科際整合將是掌握全球化優勢的重要關鍵。

以廣博通識強化風險調適能力

在全球化競爭下，人力素質的競爭不可迴避，「教育」的重要性不證自明，但究竟該在哪些教育面向多些努力？Friedman提出「世界是平的」觀點時，不斷宣導博才教育，希望在教育階段培養學子將來自我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能力。「經濟學人」亦曾強調，由於全球化時代技術衝擊太快，每個人的比較優勢也在快速調整，所以教育應該要培養學子一般技能，以利其未來之可能移動，而不是太早讓學子專注於特殊技能，增加將來轉業困難的風險。為因應全球競爭規模擴大帶來的影響，學者專家提出的「避險」策略有志一同。回頭看台灣，在科技快速更新的時代，當然應該重視科學教育、普及網路資源、消滅數位落差，但此時更要緊的是「如何增進一般勞工的調適能力」。若是如Friedman所說，全球化下將產生許多技術互補的可能，一般性的通識教育當然更是值得重視，因為唯有廣博的通識，才能有餘裕因應多種專業之間所新增的互補性。

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更強調透過「教育政策」來扭轉所得分配惡化的趨勢。最近幾年，愈來愈多人注意到北歐五國，在國家競爭力排行中名列前茅。北歐的高賦稅、高福利與美式資本主義是截然相反的對比，但北歐藉由良好教育體制、社會資本與終身學習制度，厚植整個社會的風險調適能力，值得進一步觀察。近期政府提出的十二年國教，是一個正確的資源分配方向，但如何一改填鴨式的升學主義，設計一套能夠因應全球化世界的新教育系統，已成為新的挑戰。

全球化效果：競爭規模擴大型態改變

總結來說，全球具有兩大效果：一是競爭規模的擴大（magn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scale）：由於要素投入的來源變多，供給的市場變大，企業與個人面對的競爭規模是變大的。二是競爭型態的改變（expansion of competition scope）：全球化下幾乎研發、生產、行銷各個面向，都可以成為「豬羊變色」的創新場域。

全球化使競爭規模、視野擴大，知識經濟上游如美國，可以在研發創新獲利，而市場原料與平台則讓下游的東協加一崛起。但是，台灣在哪裡呢？我們都相信台灣的企業家很

能挨得住拳、承受衝擊，但我們也都非常惶恐，因為到現在台灣仍然綁手綁腳，找不出靈活應變的能力何在。以台積電來說，如果政府政策一直無法因應全球化的變革，那麼，未來台積電何以和英特爾在半導體產業上競爭？

最後，想說一句話。其實這句話，早在五、六年前，我們就已經說過了，但很不幸的，現在還是必須再講一遍，顯然這些年來，台灣沒有什麼長進。希望這次說過以後，再也不用重提。那就是：「親近你的朋友，更要親近你的敵人。」